

基于国际文化遗产展示与阐释理论对上海红色遗址遗迹展示与阐释现状的思考

Applying the International Cultural Heritage Presentation and Interpretation Theory in Shanghai Red Heritage Sites

文 / 任 伟 同济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 在站博士后

国际古迹遗址保护理事会阐释与展示科学委员会 (ICOMOS-ICIP) 副主席

陈显鸿 同济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硕士研究生 (通讯作者)

杜 明 同济大学建筑设计研究院 (集团) 有限公司 高级工程师

基金项目: 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青年课题“基于三维可视化的上海红色遗址遗迹价值阐释模式研究”(项目编号: 2018EGL002);

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资助项目“基于人工智能三维可视化技术的世界遗产突出普遍价值阐释研究”(项目编号: 2019M661616);

同济大学建筑设计研究院 (集团) 有限公司“AI+ 上海博物馆人工智能应用场景研究”(项目编号: 2020KY26);

同济大学建筑设计研究院 (集团) 有限公司“基于三维可视技术对海龙屯世界遗产价值阐释研究”(项目编号: 2020KY34)

DOI: 10.19875/j.cnki.jzywh.2020.12.002

引言

文化遗产展示与阐释是将遗产信息通过各种媒介和技术手段传播给游客的方式。作为遗产价值和游客的信息桥梁, 文化遗产展示与阐释让游客充分知晓遗产价值至关重要。基于场所认知 (Place identity) 的角度, 上海往往被认为是中国的金融中心之一, 但是其中国革命红色源头的形象往往被弱化。中国共产党诞生于上海, 是革命志士开展革命活动的重要发源地。上海是中国红色文化的重要堡垒, 拥有“开天辟地, 敢为人先”的“红色基因”。上海红色遗产遗址资源非常丰富, “上海红色历史纪念地遗址发掘项目”的研究成果表明, 当前已认定的上海红色革命纪念地共 1020 处, 其中包含中共一大会址在内的 50 处第一等级红色纪念地、在沪中共中央机关在内的 125 处二级纪念地及其他第三等级红色史迹, 红色革命纪念地遍及中国革命、建设、改革等各个历史时期。中央和上海市对红色文化资源的保护利用工作日益重视, 尤其是在全国范围内开展的“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活动, 使得上海市红色遗产遗址游客量实现爆发式增长, 仅中共一大会址 2018 年接待的游客量就达到 146.6 万人次, 较 2017 年增长 76%^[1]。

尽管当前上海市红色文化资源利用工作取得了诸多成绩, 也应正视上海红色遗产遗址数量虽多, 但遗产价值展示与阐释现状却并不乐观的现实。不仅存在红色遗产的价值无法充分有效地让群众重视和了解国内其他红色遗产保护利用的普遍问题, 而且因上海国际化大都市的世界地位, 海派文化、江南文化和红色文化交织的历史底蕴以及红色遗址遗迹与城市建设高度交融的现状, 对上海红色遗址遗迹的保护利用, 尤其是价值展示阐释提出了极高的要求。因此, 如何结合科技手段, 多样化、全方位地展示与阐释红色文化遗产价值, 用分众化的红色文化产品讲好故事, 满足不同群体多样化的需求, 发挥红色文化的遗产教育功能, 对打响“上海文化”品牌, 实现上海市进一步发展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2]。

基于国际文化遗产展示与阐释理论和中国的实际情况,文章提出中国红色遗址遗迹展示与阐释应该以红色价值信息文脉挖掘、遗产价值展示阐释形式、历史遗址地与党性教育和遗产持续治理与包容性4个方面作为发展重点。文章基于以上理论对上海红色遗产遗迹展示与阐释现状进行了分析,指出了上海红色遗产展示与阐释领域面临的实际问题,并且针对问题提出借助人工智能三维可视化技术等新兴技术提升红色遗址遗迹展示与阐释价值的建议。

1 国际文化遗产展示与阐释理论

文化遗产展示与阐释的理念一直是国内外遗产价值研究关注的焦点。作为文化遗产展示与阐释的权威机构,国际古迹遗址理事会展示与阐释科学委员会(ICOMOS-ICIP)继承了《威尼斯宪章》(1964)中“在国际范围内协商和制定指导古建筑保护和修复的原则,并由各个国家负责在本国文化和传统的框架内实施”这一使命,针对具体保护问题建立了专业指导准则,并鼓励在世界各地有效地宣传遗产保护的重要性。

在早期对世界文化遗产的研究中,一般将“展示”和“阐释”表述为遗产教育与宣传,认为它们是增强公众遗产保护意识的手段^[3]。自1931年《雅典宪章》中遗产展示与阐释概念雏形的提出以及1957年弗利曼·提尔顿(Freeman Tilden)^[4]对阐释概念的明确,包括《威尼斯宪章》《考古遗产保护与管理宪章》《巴拉宪章》《世界遗产布达佩斯宣言》等各类宪章、决议、宣言中,频繁地出现“展示”“阐释”等表述方式,其概念内涵随着科技社会发展的需要不断得到延伸和发展,从对“遗产”本身真实性的展现转变为更强调文化遗产信息以叙事方式有效传达的教育活动^[5]。

2008年,国际古迹遗址理事会展示与阐释科学委员会(ICOMOS-ICIP)在《文化遗产阐释与展示宪章》(The ICOMOS Charter for the Interpretation and Presentation of Cultural Heritage Sites)中对“阐释”和“展示”给出了明确的概念:“展示(presentation)尤其指在文化遗产地通过对阐释信息的安排、直接的接触以及展示设施等有计划地展现阐释内容。可通过各种技术手段来传递信息,包括(但不限于)信息板、博物馆展览、精心设计的游览路线、讲座和参观讲解、多媒体应用和网站等。”“阐释(interpretation)”是指“一切可能的、旨在增强公众意识、增进公众对文化遗产理解的活动。可包含印刷品和电子出版物、公众讲座、现场及场外设施、教育项目、社区活动以及对阐释过程本身的持续研究、培训和评估”,也就是解决参观者“看什么”和“怎么看”的问题^[5]。

20世纪以后,现代文化遗产保护逐渐发展并形成了较为成熟的理论体系和技术手段。文化遗产的展示和阐释研究思路从对遗产物质实体的“保护”和“修复”,到对遗产及其环境背景的整体性保存,进而发展到向社会公众全面展示遗产的历史文化内涵^[6],并逐渐呈现出多学科交叉渗透的趋势。在历史学视野下,以弗里曼·提尔顿、约翰·A.维弗卡(John A Veverka)^①、大卫·洛文萨尔(Lowenthal D)^②等为代表的学者,从文化遗产阐释必要性、原则、方式、价值、模型和内容进行探讨,旨在强调利用多学科揭示文化遗产内在联系,在保证其原真性、完整性的前提下实现和公众的对话^[7]。总之,将阐释和展示视为文化遗产保护和管理的重要组成部分,利用阐释与展示活动在历史与现代间建立有效联系,揭示文化遗产的内在关联性,实现公众与遗产的对话,促进文化遗产价值的传播成为当前整个国际文化遗产保护界的共识^[8]。

基于国际文化遗产保护视角,《文化遗产阐释与展示宪章》提出7项主要原则作为遗产阐释与展示形式的基础。原则一是接触渠道和理解,在此原则上的遗产阐释与展示重在促进公众接触文化遗产本体和相关知识;原则二是信息源,即通过科学技术方法识别文化传统和遗产地的价值,并向各受众宣传文化遗产地的意义和内涵;原则三是重视背景环境和文脉,侧重结合其广泛的社会、文化、历史以及自然的发展脉络和背景环境;原则四是保持真实性,在展示与阐释的过程中必须遵守《奈良文件》(1994)中关于真实性的基本原则;原则五是可持续性,强调阐释规划必须尊重遗产地的自然和文化环境,其核心目标应包括社会、经济 and 环境的可持续性;原则六是涵盖与包容性,尊重遗产专家、遗产地负责机构和相关社区以及其他利益相关者共同的有意义合作的结果;原则七是研究、培训和评估的重要性,不断进行研究、培训和评估是文化遗产地阐释工作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

红色遗产作为文化遗产的一种形式,其核心价值在于红色文化和历史的积淀。国际遗产展示与阐释理论作为舶来品,在红色遗产价值传播上与原则接轨,但是在方式上也具有中国特色。相较于国外学者对文化遗产展示阐释问题研究的广泛关注,国内学者的研究仍集中在对文化遗产本身的保护上。针对当前国内文化遗产在面对受众和市场时暴露出来的诸多问题,国内学者从阐释展示方法、阐释展示模式以及实现手段等方面对我国文化遗产阐释和展示进行了探讨。但就目前的研究成果来看,对于文化遗产阐释与利用的研究,尤其是具有意识形态教育工具的红色遗产遗迹的阐释与展示研究多散见于个体或者某一类型的研究中,没有形成完整的文化遗产展示与阐释体系。因此,本文把中国红色遗产展示与阐释研究逻辑归纳为4个重点:

(1) 红色价值信息文脉挖掘,即是否深刻地挖掘了红色遗产遗迹背后的历史事件、事件意义、完整的口头和书面信息、物质遗存。

(2) 遗产价值展示阐释形式,即阐释与展示活动应形式多样,并能够实实在在地接近公众。

(3) 历史遗址地与党性教育,即红色阐释项目都应成为各年龄层次的接受公众教育资源。展示设计应考虑其应用在学校课程、非正式和终生学习项目、通信和信息媒体、特殊活动、大型活动中的可能性以及季节性志愿者的参与。为此,应鼓励召开国际会议、专业人员的研讨和交流以及全国和地方会议。这些都将成为定期分享各地区和各种文化背景下的多元阐释方法和经验提供机会。

(4) 遗产持续治理与包容性,即红色遗产项目的设计和应与文化遗址地总体规划、预算和管理相协调。在展示过程中全面考虑到阐释设施和游客数量对红色遗产的文化价值、外部特征、完整性和自然环境的潜在影响。在阐释与展示项目的制定过程中,应当整合学者、社区成员、遗产保护专家、政府机构、遗产地管理者和讲解员、旅游经营者和其他专业人士的多学科专业知识。

2 上海红色遗产遗址价值展示与阐释领域问题分析

红色遗址遗迹是中国共产党发展历程的重要载体,见证了中国共产党重要的发展历程。红色遗址遗迹存虽然可以印证红色事件鲜活的发展历史,但是却与当时发生重要历史事件的建筑风貌有一定差距。红色遗址遗迹的价值阐释除了阐释载体本身的历史文化价值以外,更重要的是展示与阐释中国共产党经历的历史事件与载体本身的关系,肩负了传播中国共产党发展史,提升共产党人党性教育的重要职责与使命。

2.1 遗产价值信息文脉挖掘缺乏深刻，但是缺乏“红色 IP”

中国党史红色遗产是红色信息的核心，上海红色遗址遗迹的历史研究是相对深刻和全面的。当前的文化旅游市场需求明显提升，在国内语境下“IP”这一名词的含义更为丰富，它具有内容化、人格化和商业化的特性，是围绕核心价值的阐释而形成的一系列创造性的文化表达和文化产品^[9]。文化旅游的实践证明，明确清晰的“IP”有助于在受众心中留下稳定、深刻的印象，赋予市场固定消费者以固定的认识。对上海而言，消费者对上海的印象基本停留在“十里洋场”“东方巴黎”以及改革开放以后的“经济中心”“超级城市”等，谈及红色旅游，消费者往往会选择“遵义会议”“井冈山精神”“红船精神”等具有标志性“IP”的目的地，而忽视上海丰富的红色遗址遗迹以及“红色发源地”背后深厚的红色文化积淀。同时，尽管各大红色场馆在积极根据自身特色开发红色文创产品给参观者传递价值，提升上海红色文化知名度，例如利用3D打印技术仿制的国家一级文物“菊花砚”、复原的“一大”会议召开现场的摆件，但整体上没有形成有针对性的“上海红色文化”“IP”市场化、专业化的文创研发环境，使现有的红色文创产品不管是品种还是质量都呈现出静态化、同质化特征，与市场需求有着巨大的差距，消费者对上海的城市印象亦剥离了红色文化、红色旅游这一重要内容。

2.2 上海红色遗产价值展示阐释形式手段同质化

我国红色遗址遗迹具有有强烈的政治色彩，这一特殊性决定了其在展示与阐释方式及手段上会更为严肃。虽然少数上海红色文化遗产遗址研究者已经开始探索如何利用新兴科技手段更好地展示红色价值，但是大部分上海红色文化遗址遗迹在价值展示与阐释方式上依然沿用传统、保守的图片，少量历史文物配合语音讲解的模式，参观者的体验往往停留在对史实简单、片面的了解层面。例如，中共一大会址的“初心大讲堂”、上海龙华烈士陵园的“龙华精神·英雄之城”沉浸式红色旅游产品都采用了展示技术，但是这些精彩的展示技术尚未在上海其他红色景区大规模推行。

除此以外，专家学者在研究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研究成果一般无法直接展示在普通参观者面前，更不能让普通参观者有身临其境的机会充分认知红色遗址遗迹价值。因此，学界认定的红色遗址遗迹价值与普通游客对红色遗址价值的认知之间存在巨大的鸿沟。对于普通游客，尤其是对年轻游客群体而言，传统红色文化阐释模式的吸引力非常有限，在讲解员配备不足或缺乏语音讲解系统的情况下，游客走马观花地参观，既感受不到该遗址遗迹在中国共产党发展历史上所处的独特地位，更无法与该遗址遗迹想要展示与阐释的价值核心产生共鸣。

2.3 红色历史遗址地党性教育内容的单调无针对性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多重温我们党领导人民进行革命的伟大历史，心中就会增添很多正能量^③”。红色遗址遗迹承载着特殊的历史积淀，蕴含着中国共产党人和中国人民的革命精神，天然地承担了重要的爱国主义教育党性教育现场教学的责任。作为中国共产党的“发源地”，上海红色遗址遗迹与中国近代史诸多关键节点高度契合^[10]。参观者身处历史事件发生地，结合生动立体的故事讲述能够以小见大，产生强烈的视觉效应与心灵震撼。上海市中小学、高校以及各级党校都将红色遗址遗迹的参观作为爱国主义教育和党性教育课程的重要教学内容。例如，上海市委党校就有中共一大会址、陈云纪念馆等一批现场教学点。但目前上海普遍开展的爱国主义教育课程、高校思想政治课以及党性教育现场课程，由于遗址遗迹场地狭小、展示条件有限、科研人才缺乏等表现出教学场地数与受众需求数不对等，现场课程展示阐释形式单一，教学内容深度、广度不足以及教学力量薄弱等共性问题^[11]，无法满足不同层次、不同受众群体的多样化参观需求。

2.4 红色遗产持续治理分散与缺乏多元化性

上海红色遗址遗迹的单位性质与隶属关系较为复杂,大体分为市委市政府、区委区政府、教育部所属高校以及部队系统四大类,其下又分属于不同的主管部门。例如同属市级主管的陈云纪念馆隶属于市委宣传部,龙华烈士纪念馆隶属于市民政局^[12]。在日常运营上各成体系,管理分散且头绪众多。为此,上海市也从多种角度创新尝试,试图打破红色遗产遗迹管理的壁垒。早在2005年,上海市就开始在市级层面逐步整合统筹全市红色资源,推动红色旅游精品线路的宣传推广,并在2018年新推出由16个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共同构成的红色文化修身路线^[13]。2019年,上海成立了全国首家由地方党委、党史研究部门、教育主管部门、高等院校四方携手联创,融红色文化学术研究、思政实践、宣教陈列、文物征集、文创研发为一体的红色文化研究基地——上海红色文化研究院,市级层面建立了如中共一大纪念馆筹建工程等重点项目的工作领导小组。但这些机构既不是法定执行机构,也没有相关执法权,缺乏在上海市层面对红色文化遗产的统一管理与有效调控,这样的整合与实践无法打破红色遗产遗迹在管理归属层面的壁垒。同时,政府红色文化旅游推介主要以中共一大会址、龙华烈士陵园等高等级的红色遗址遗迹为主,缺少市郊的和专项的红色遗址遗迹旅游路线的设计和开放,而对存在数量最多的区级主管的红色遗址遗迹的整合利用还存在巨大的差距。

价值展示与阐释形式缺乏多元化的交互体验。在数字化媒介发展日新月异的今天,展示阐释的方式正经历着由原子形态下,物理陈列到数字形态下信息互动呈现的颠覆式转型。有赖于数字化呈现的灵活性,现有的科技水平已能够实现遗址遗迹价值的展示与阐释突破空间与时间限制,借助智能手机等媒介实现实物展品的数字化特征与参观者个体兴趣实现互动。这种参观的个性化、多元化“交互性”是当前红色文化遗址遗迹展示与阐释受众的现实需求。然而在上海众多的红色遗址遗迹的展示和陈列中,主要采用的仍是“跟着解说牌走”的传统参观路径,参观者单方面被动接受统一的解说牌或者导游解说的价值传递^[14]。交互性的展示阐释手段运用极少,参观者获取信息的途径也缺乏可选择性、趣味性,导致参观者参与积极性与满意度不高。

3 政策建议

对上海而言,红色文化交织在现代化的国际化大都市发展中,红色遗址遗迹的展示与阐释相较于其他红色遗产地而言有着独特的城市特征,也展现出对红色遗址遗迹展示阐释现代化、时代性的现实要求。在上海市提出全力打响“上海文化”品牌,加快建成国际文化大都市的战略背景下,利用科技力量创新红色遗址遗迹展示阐释手段,助力红色文化遗产价值传递,是当前上海面临的巨大挑战,亦是发展机遇。

3.1 应用人工智能技术辅助进一步深化红色遗址遗迹价值研究

红色文化遗产价值的展示与阐释建立在历史真实性的基础之上,因此科研须走在实践的前面,用最新的科研成果来指导红色遗址遗迹保护和活化利用实践。对于红色遗址遗迹数字化展示与阐释多样性的构建在于对内在价值的深入发掘上,而非技术本身。红色遗址遗迹作为具有中国特色的文化符号,其在发展过程中面临诸多矛盾以及价值独特性,不管是红色文化遗产所承载的这段历史,还是各时期出现的代表人物和典型事件,其背后都蕴含着深刻的中国共产党人和中国人民在革命时期不同阶段展现的不同精神风貌以及革命精神,这要求红色文化遗产要从史实、品牌、生态等多层面进行价值提炼,构建多维网络以实现受众的深度体验。利用人工智能技术和机器学习技术简化、替代传统人力对大量历史文献进行的重复性分析工作,通过大数据,分析并实现对街道和建筑样式的变迁、不同人物视角下历史事件的史实、重要人物的生平等内容更为精准的信息提炼,最大程度实现史实还原,并借助社交平台、三维可视化设备等媒介实现数字化成果与个体的内容互动和价值传递^[15]。

3.2 借助人工智能三维可视化等新兴技术提升红色文化遗产展示与阐释水平

面对红色文化遗产在社会需求急剧上升阶段与自身展示与阐释泛化产生的矛盾，将红色文化遗产价值进行数字化深度展示与阐释，是红色文化遗产活化利用下一步必然的发展方向。

基于三维可视化技术，在提升红色文化遗产价值展示与阐释方面具有重要意义。三维可视化技术让参观者可以更加直观地了解红色文化遗产价值。利用三维可视化系统制作的虚拟现实和增强现实展示平台，游客可以通过视觉感官和声音配合身临其境。在制作精良的三维影音动画效果支持下体现红色文化遗产的突出价值，让游客在 15 ~ 45 分钟内可以充分感知到红色文化遗产价值，从而获得更好的沉浸式旅行体验。从历史的“旁观者”变成“参与者”，这样的旅游方式能够吸引更多的年轻人主动了解、感受红色文化遗产的魅力，并亲身体会时代的发展和历史的变迁，对红色文化遗产的保护和利用具有跨时代的重要意义。基于对三维可视化技术的深度了解，从促进红色文化遗产三维可视化价值阐释成果服务红色旅游资源向红色旅游基地的转型升级、开发受市场欢迎的红色旅游产品、建设相关从业人员队伍等多方面入手，最终推动对红色文化遗产的保护和利用。

3.3 立足红色党性个体特点运用多元化展示手段

遗址遗迹是红色旅游具有吸引力的主要资源。上海市内红色遗址遗迹数量众多、类型多样、分布面积广。大量红色遗址遗迹位于建筑密集的居民区，复杂的遗址遗迹现状使得价值的展示与阐释更需要被分类、分层，针对具体条件应用不同的展示和阐释手法，使受众拥有更丰富的参观体验和参观选择。

面积较为广阔的遗址遗迹，如龙华烈士陵园等遗址遗迹，应着力打造红色体验式的参观点。通过建筑群设计、参观动线安排以及氛围营造等外在因素，将自然风貌、历史遗迹以及自身展示阐释的革命历史与价值结合，打破传统革命遗址遗迹以图片、橱窗展示等静态展示方式，增加受众在参观过程中进行互动体验的环节，例如利用光影技术打造沉浸式红色文化体验馆、打造还原革命年代互动式情景剧等，通过互动体验环节的设置，增加游客可进入、乐停留、喜欣赏、常回味的参观感受，使游客在互动活动中的经历触摸、感悟红色文化所要传达的革命精神与价值^[1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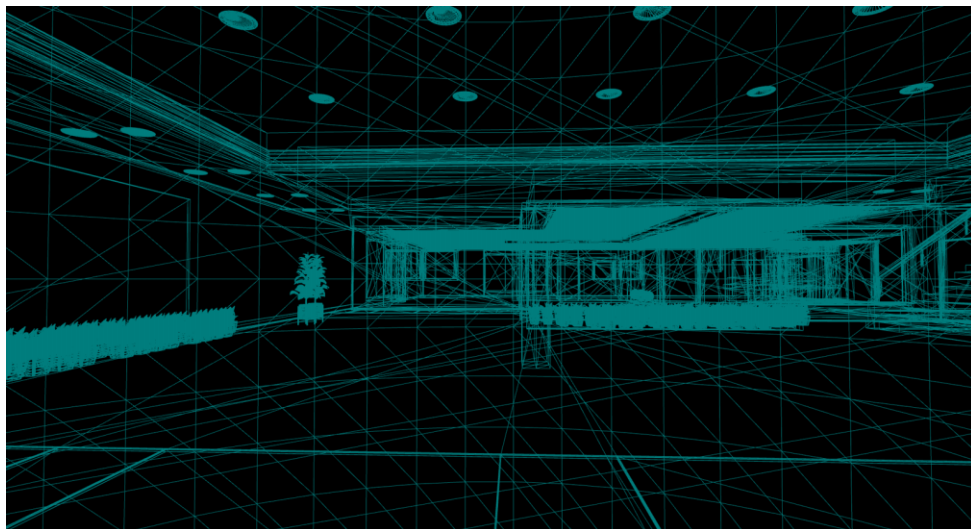
位于居民区的革命旧址如中共一大会址，因其占地面积小、参观人数较多，导致参观时间相对有限，需要积极借助科技手段，在有限的参观时间内使参观者拥有丰富、深度的参观体验。因此在展示与阐释中要尽可能地打破遗址遗迹的空间壁垒，将参观者的参观体验延伸到场馆之外。例如，使参观者通过手机进行“云游览”，提升实地参观时的体验；在参观之外组织观看相关事件电影，加深参观者对发生于该红色遗址遗迹的历史事件的直观感悟；通过创新现有文创产品进一步延伸和传递红色文化价值（图1）。



(a) 上海中共一大会址主厅虚拟现实效果



(b) 上海中共一大会址主厅现场实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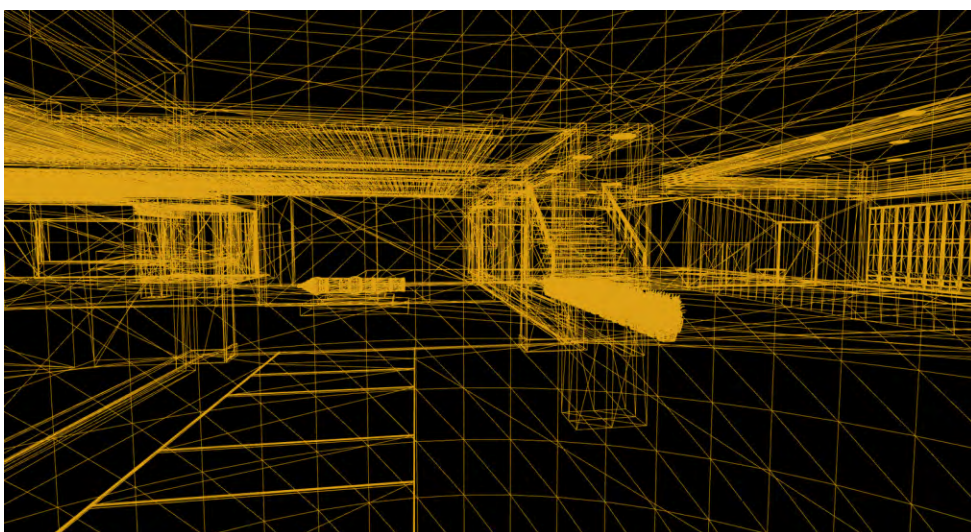
(c) 上海中共一大会址主厅虚拟现实场景建筑信息模型



(d) 上海中共一大会址侧厅虚拟现实效果



(e) 上海中共一大会址侧厅现场实景



(f) 上海中共一大会址侧厅虚拟现实场景建筑信息模型

图1 中共一大会址 VR 展示与实景对比 (图片来源: 作者自绘和作者摄影)

3.4 整合资源，科学构建红色文化可持续治理体制

想要保护和充分利用上海红色资源，需要在全市层面进行整体统筹。近年来，在上海市级层面的重视与推动下，上海市市级、区级党史研究部门和旅游、文化部门通力合作，为全市红色文化资源的统筹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在此基础上，须进一步统筹全市组织、宣传、文广、旅游、交通、高校、党校、社科研究等部门，整合资源在红色文化遗址遗迹的推广、历史价值挖掘、产业联动运作等方面进行深度挖掘和探索，成立常设性红色遗产遗迹管理机构，并推动红色遗产遗迹地方立法工作的开展。结合交通、旅游等大数据统计平台，根据当前红色文化旅游、教育受众需求，围绕“中国革命发源地”主题，鼓励文化产业企业推出文创产品，有体系地推出辐射面更广的红色主题旅游线、爱国主义参观线及系列党性教育参观课程，使全市独立分散的红色遗址遗迹根据历史发展脉络、所处区域等条件整合为互有关联的整体，从而形成鲜明的上海“红色文化IP”，并使其成为上海新的城市标签。

结语

文章基于国际文化遗产展示与阐释理论提出中国红色遗址遗迹展示与阐释应该以红色价值信息文脉挖掘、遗产价值展示阐释形式、历史遗址地与党性教育和遗产持续治理与包容性 4 个方面作为发展重点。对上海红色遗产遗迹展示与阐释现状进行了分析，指出了上海红色文脉挖掘缺乏深度、红色遗产价值展示阐释形式手段同质化、遗址地党性教育无针对性、红色遗产持续治理分散与缺乏多元化性等问题，并且针对问题提出了借助人工智能三维可视化等先进技术深度挖掘红色遗产价值，提升红色文化遗产展示与阐释水平，整合构架红色文化可持续治理体制的发展建议。

中国共产党的价值理念和精神追求是上海红色遗址遗迹展现的内在价值，亦呈现出不同历史时期上海人民所共有的革命精神和独立气质。因此，上海在打造“上海文化”品牌时强调了红色文化对上海的重要性，并开展“党的诞生地发掘宣传专项行动”，将建党精神与城市精神结合起来，将红色血脉与城市文脉结合起来。探索将红色遗址遗迹资源转化为产业优势，通过三维可视化技术等科技手段丰富红色文化价值的展示与阐释的形式和方法，这不仅涉及技术层面，更是下一步对上海红色遗址遗迹进行保护和可持续利用的重要方式。

注释：

- [1] (美) 约翰·A. 维佛卡 (Veverka, J.A.) 著, 郭毓洁、吴必虎、于萍译. 旅游解说总体规划 [M]. 北京: 中国旅游出版社, 2008.
- [2] Lowenthal D. The Past is Foreign Country [M].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5.
- [3] 国家主席习近平 2013 年 7 月 11 日在河北省平山县西柏坡调研指导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时强调。

参考文献：

- [1] 曹玲娟. 中共一大会议纪念馆——守护好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家园 (革命遗址新貌) [N]. 人民日报, 2019-05-08(06).
- [2] 高福进, 孙冲亚. 上海: 红色文化是如何形成并辐射的 [N]. 上观新闻, 2019-12-22 (网络版).
- [3] 丛桂芹. 文化遗产保护中阐释与传播理念的凸显 [J]. 建筑与文化, 2013(03):60-61.
- [4] TILDEN F. Interpreting Our Heritage [M]. 3rd edition. Chapel Hill: The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Press, 1977.
- [5] 李金蔓, 闫金强. 世界文化遗产阐释与展示的启示——以哈德良长城为例 [J]. 遗产与保护研究, 2018, 9(3):133-139.
- [6] 郭璇. 文化遗产展示的理念与方法初探 [J]. 建筑学报, 2009(09):69-73.
- [7] 周婧景, 严建强. 阐释系统: 一种强化博物馆展览传播效应的新探索 [J]. 东南文化, 2016(02):119-128.
- [8] 孙婷, 李永乐. 运河历史档案与大运河文化遗产的阐释与展示 [J]. 档案与建设, 2019(07):32-35.
- [9] 王晶. 延安市旅游超级 IP 探索 [D]. 北京: 北京大学, 2018.
- [10] 李彬彬. 上海红色资源融入中国近现代史纲要课程教学的路径 [J]. 西部素质教育, 2019, 21(5):31-32.
- [11] 薛峰, 张文, 吴浩波. 发挥上海红色资源优势 打造党性教育精品课程——以龙华烈士陵园为例 [J]. 党政论坛, 2018(10):59-61.
- [12] 朱克勇, 姜勇, 年士萍. 开发利用上海红色资源 推进干部理想信念教育 [J]. 上海党史与党建, 2018(02):34-36.
- [13] 贾彦. 上海推出首条“红色文化”修身路线 [J]. 上海党史与党建, 2018(08):63.
- [14] 姜中, 鲁晓波. 展示传播在文化遗产数字化中的交互性及其应用——以敦煌文化的当代传播为例 [J]. 现代传播, 2013(08):19-23.
- [15] 任伟, 韩峰, 杨晨. 欧盟地平线 2020 框架下新兴技术在文化遗产活化领域的应用 [C]. 上海: 第三届国际“数字化文化遗产: 未来视界”系列会议“未来视界·景观视角”论文集, 2019.
- [16] 董建. 关于打造上海红色文化体验式旅游的建议 [J]. 上海人大月刊, 2018(08):28.